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26

# 初唐四杰

林清晖 林东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26

# 初唐四杰

林清晖 林东海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初唐四杰/林清晖等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1981-0

I. 初… II. 林… III. ①唐诗—文学评论—中国②初唐四杰—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704 号

## 初唐四杰

林清晖 林东海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8 千字 印张: 3 $\frac{1}{2}$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 颖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奇萍

---

ISBN 7-5313-1981-0/I·1719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 目 录

引 言/1

- 一、标格渐高——初唐诗坛概貌/2
  - 二、龙文虎脊——“初唐四杰”/9
  - 三、唐音序曲——“四杰”的诗歌/17
  - 四、骈体余风——“四杰”的文章/29
  - 五、沉响风蝉——骆宾王/35
  - 六、失水穷鱼——卢照邻/55
  - 七、落霞孤鹜——王勃/73
  - 八、行潦浮沤——杨炯/91
- 结 语/105

## 引 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论诗之作《戏为六绝句》中的两首。“王杨卢骆”指的是初唐时期四位作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即著名的“初唐四杰”。“四杰”在当时颇遭物议，其人品被讥为“浮躁浅露”，其文章则被斥为“劣于汉魏”。而杜甫却在诗中为这四位前辈作家辩护，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把他们比作“龙文虎脊”，“过都历块”的骏马，可与江河并流传于万古。

对“四杰”的看法和评价，不仅于当时存在异议，其后各代也众说纷纭。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认识“四杰”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呢？把他们放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再对其生平思想以及创作实践加以认真的考察，庶几可以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

## 一、标格渐高——初唐诗坛概貌

中国向来被称为诗的国度，而唐诗则是这诗国中最绚烂的花朵。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唐朝不仅政治经济空前繁荣，在文化领域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到诗歌而言，有唐一代，留存诗歌近五万首，兼具古体、近体等各种诗体，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什不可胜数。唐朝又是诗人辈出的时代。除了李白、杜甫两位伟大诗人，还出现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等一批开宗立派、风格独具的大家，有成就、有影响的诗人不下五六十家。

唐诗又以盛唐诗为顶峰。闻一多先生在其未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稿》中将中国近四千年的古代文学划分为三大阶段、七个时期。其中汉代建安元年(196)到唐代天宝十四年(755)，共五百六十年是第五个时期，他称之为“诗的黄金时期”(见《朱自清序跋书评集》)。慷慨任气、磊落使才的“建安风骨”和反映盛唐时期蓬勃向上力量的“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美学概念，被看作是这个时期诗歌演变的起点和终点。唐朝诗歌评论家殷璠以“声律风骨

始备”概括盛唐气象的内涵。考察从六朝到盛唐诗歌的发展,如果说六朝时期文学的醒觉,诗歌在语言、手法和技巧方面的发展,是追求声律的阶段,那么初唐时期则是追求风骨、气象,形成“盛唐气象”的关键阶段。而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初唐四杰”则是为唐诗告别齐梁影响,走向盛唐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诗人群体。

要准确把握“四杰”在初唐诗史中的作用,我们有必要对初唐近百年的诗歌发展历程进行一下回顾。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景云中约九十年左右时间,是盛唐诗歌的准备期,是在对南朝诗歌的继承和革新中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关于这一阶段诗歌风貌与盛唐诗歌高峰之间的关系,历代学者早有所关注。殷璠《河岳英灵集叙》云:“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遥远调。”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则称:“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阁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泊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前者从反齐梁绮靡文风为出发点论初唐诗歌,提及三个时间概念,基本概括了初唐几个发展阶段和各阶段的整体风貌。后者结合具体作家的创作特点描述了初唐诗的发展。

根据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文学思想的变化,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唐朝建立到贞观末,永徽年间到垂拱,垂拱末到景云年间。而从诗人群体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分为宫廷文人与在野寒士两个群体。其中宫廷文人可以再细分为重臣文人与侍从文人。

从武德(618)初到贞观末(649)近三十年时间,可视为初唐诗歌发展的第一阶段。此时诗坛的主力是以“秦王府十八学士”为代表的台阁重臣。《旧唐书·太宗本纪》称“(秦王)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分夜而罢”。武德四年,李世民设文学馆招四方之士,文学馆学士成为重臣文人集团的雏形。由于李世民设文学馆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他们的学识与谋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通过他们的劝谏,从历代兴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所以重臣文人集团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在文学方面的意义,因而它首先是一个统治集团。李世民即帝位后,重臣文人成为贞观时期文化建设的中坚。

重臣文人多为旧朝遗老,许多人在陈隋之际即以文学名于世,其创作与南朝文学的传承关系极明显。如著名诗人虞世南,入唐时已年逾花甲,他的文学渊源便可以追溯到梁陈宫体诗人徐陵。与他经历相近的还有褚亮,入唐时年已五十九岁,他也曾以文学见知于徐陵。这批以高龄入唐的遗



老诗人,创造力已大为下降,难以摆脱旧的文学传统。据《全唐诗》诗人小传统计,唐初三十年“有文名者”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五首作品中,奉和、宴游、酬答之作三十七首,拟乐府二十首,宫体七首,可知这一时期的创作仍然是六朝宫廷诗的延续。

“文变染乎世情”,贞观时期的诗歌毕竟显示出丝丝时代的气息,出现一批“正声雅音”。殷璠所说的“微波尚在”、“标格渐高”,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创作风貌。太宗及重臣诗人们的许多诗篇是在宫廷之外或是战乱之中所作,诗的题材远较梁陈宫体诗为广,风格上也显出别有一番天地的气象。王珪、陈叔达、魏徵、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杨师道等人,或在诗中赞美太宗的文治武功,描绘太平盛世;或借古喻今对政治提出一些规谏。

但是李世民留心文史不过是为了“以史为鉴”,他主张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政治的得失高于文艺本身的审美特点,所以反对六朝以来“释实求华”的文艺风气。在他的影响下,贞观宫廷掀起了一场对包括魏晋文学在内的近代文学的理论批判,试图以传统的雅正之音革新六朝以来的文学。那些同样历经战乱的重臣诗人们,也意识到了政治与文艺间的密切关系,杜淹、薛收等人将魏晋齐梁文学视为糟糠,魏徵、姚思廉、李百药等人都对六朝注重形式的淫丽绮靡诗风提出了批判。魏徵从陈后主以文学纵乐的事件中总结道:“古人有言:亡国之主,多有才艺,考之梁、陈及隋,信非虚

论。然则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徒长浇伪之风，无救乱亡之祸。”他还具体提出结合南方“清绮”文学与北方“气质”文学的长处，创造出既合“时用”又可“咏歌”的至善至美的文学。这次对近代文学的批判为盛唐气象的到来做了第一次思想准备。

从贞观末(649)到景云中(710)六十年时间，跨初唐发展的两个阶段。诗人的新老交替，使得诗歌创作出现了分化。宫廷诗创作经历了短暂的衰落，又迎来第二次创作高潮，诗坛主力也由重臣文人转变为侍从文人。在宫廷中，诗歌艺术手法是从上官仪到文章四友(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沈宋”等诗人探讨的热点。而宫廷之外，“四杰”和陈子昂革新文风的努力又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做了再一-次的思想准备。

经过“贞观之治”，唐朝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上也出现人才辈出的空前繁荣。高宗、武后年间，太宗朝一批历陈隋而入唐的文人零落殆尽，一批属于唐朝自己的文人开始出现在诗坛上，他们的代表就是“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和沈佺期、宋之问。与唐朝初年的重臣文人们相比，这批文人有着全新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他们罕有显赫的门第，主要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步入仕途与诗坛。

从唐高宗永徽年间(650)到陈子昂开始写《感遇》诗的垂拱年间(685)，三十余年时间，是初唐诗

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贞观重臣对六朝文学的大批判已归于沉寂；诗坛又兴起一个探索诗歌声律、对仗、词采、技巧等方面的热潮，出现不少论诗的书籍和文章。龙朔年间(661—663)，宫廷诗人上官仪官居宰相，其绮错婉媚的诗作风靡一时，史称“上官体”，引发“竞为雕刻”的“龙朔文场变体”，诗歌观念和审美趣向，都更接近于六朝宫廷诗人，可说是六朝绮靡诗风的复炽。

“初唐四杰”所处的时代，诗风正处在过渡状态。一方面，宫廷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另一方面，随着上庶界限被打破，宫廷诗人构成成分的变化，庶族诗人相继登上诗坛。“四杰”的兴起与上官仪诗的极盛几乎同时到来。如果说上官体是六朝诗歌的回光返照，“四杰”则代表着一种新思潮的兴起。尽管他们的作品没能完全摆脱六朝余风，对龙朔年间“争构纤微”、“骨气都尽”的诗风所进行的批判显示了对宫廷诗创作模式与它所承袭的齐梁余风的否定，属于唐代自己的诗风在确立。几年后，上官仪伏诛(664)，上官体也就寿终正寝，又过几年，“四杰”离开长安，或入蜀、或西戍，初唐诗歌就开始脱离宫廷，走向江山塞漠。“四杰”创作的发展与创作思想的成熟，无疑标志着唐代最初的文学革新思潮的到来。

从陈子昂登上文坛的调露(680)年间到睿宗景云(710)中，约三十年是初唐诗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都

充分表现出为盛唐文学的到来所进行的准备基本完成。殷璠以“颇通远调”概括这一时期的诗歌风貌。确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四杰”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反映领域,充实了题材内容,奠定了昂扬基调;同时在艺术上也表现出多样性。“风骨”与“兴寄”是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基本主张。陈子昂以复古的旗号批判六朝以来“渐趋绮丽”的唯美文学,宣扬诗教传统,推崇风骨与兴寄。

从王绩到“四杰”再到陈子昂这一寒上诗人群体使诗歌摆脱了齐梁诗僵硬、千篇一律的宫廷模式,不仅表现题材得到扩展,思想境界也获得极大提高,同时诗风的个性特征也愈来愈突出。他们所提倡的昂扬壮大的情思,“风骨”、“兴寄”是构成“盛唐气象”的基本因素。

## 二、龙文虎脊——“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的提法最早见于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骆宾王，婺州义乌人也，年七岁，能属文。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郗云卿受唐中宗之命编辑骆宾王文集，从他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四杰”的称号当时就已存在，而且就郗序行文来看，“四杰”的称谓当在四人都在世时。唐高宗李治于永徽元年（650）到开耀二年（650—659）在位三十四年。即位之初，王勃、杨炯刚刚出生，所以高宗朝的前期不会有此称谓。王勃卒于上元三年（676），由此推论“初唐四杰”这一称谓应该出现在高宗咸亨、上元年间，即公元670到676年之间。

骆卢王杨四人都是少年即负才名。骆宾王七岁赋诗，被称为神童；卢照邻十岁左右就从名师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写文章“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风回鸾惊”（《释疾文·粤若》），也是富于文才的少年；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旧唐书·本传》），年纪稍长，又通六经，指瑕《汉书》，十四岁作流传千古的《滕王阁序》，年末

及冠而名动京师；杨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旧唐书·本传》），以文才应童子科及第，待制弘文馆，著名诗人张说称赞他：“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由此不难看出“四杰”都是高才少年。

“四杰”虽然才高八斗，文名远播，而又都兼具狂放狷介、恃才傲物的禀性。《旧唐书·骆宾王传》载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曾先后作长诗《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和《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为两位弃妇鸣冤抱不平。他和卢照邻都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王勃更是因为杀人而获罪当死，杨炯为官也颇有恶名。以至丁当时人有“浮躁浅露”的评语。四人空怀报国之志，始终蹉跎官场，最终的结局也相当悲惨，四人中除了杨炯终于益川令，其余三人都死于非命。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反对武则天的起义，兵败不知所终；卢照邻因不堪疾病之苦，投水自杀；王勃渡海省父，溺水而亡。闻一多先生以“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唐诗杂论·四杰》）来概括四杰气质禀性、人生经历的这些共同点，大致是不错的。

从生平年代来看，卢骆年长王杨十余岁，应属于两代人。且卢照邻与宋之问的父亲宋令文曾一同拜名医孙思邈为师，而杨炯曾与宋之问同在习艺馆任职。但是关于“四杰”名次的排列历来说法不一。盛唐以前文献中共有三种记载。郝云卿《骆宾王文集序》称骆卢杨王，张说《太尉裴公神道

碑》称骆卢王杨，而张鷟《朝野僉载》则称王杨卢骆。可见“四杰”成名之初，名次并无定论，起始多以骆卢居前，大约与年龄先后有关。后来按王杨卢骆定称，据载是按照才艺优劣而分先后。如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新唐书·王勃传》也称：“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人而论”也标举“王杨卢骆”体。对王勃列名“四杰”之首，卢照邻表示承认而杨炯却持否定态度。当时的舆论以及张说、崔融等都对杨炯的不平表示赞同。《朝野僉载》称：“……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旧唐书·杨炯传》也载：“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杨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及。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旧唐书·文苑传》称卢照邻有文集二十卷，杨炯有文集三十卷，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的文集有二十卷，郝云卿辑骆宾王文集十卷。而今存的篇什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以今存的诗文对“四杰”排名重新划分，颇为困难。但综合后世学者的观

点,基本认同王勃在四杰中成就最高,其他三人则不可轩轻。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就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依据各人诗文成就评四杰为王、骆、杨、卢:“(王勃)《滕王阁序》神俊无前,六代体裁,几于一变。即‘画栋珠帘’四韵,亦唐人短歌之绝。五言诸律靡不精工。杨《浑天》仿《三都》,卢《五悲》趋步《九辩》。近体气骨有余,风华未及。宾王武氏一檄,足为文人吐气。诸排律沉雄富丽,沈宋前鞭。以吾评王为最,骆次之,杨卢次之。”明代竟陵派的钟惺也说:“王杨卢骆偶然同时有此称耳……王森秀,非三子可比。卢稍优于骆,杨寥寥数作,又不能佳,何其称焉!”(《唐诗归》卷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载:“勃文章钜丽,为四杰之冠,诸家总集,所录特多”,把王勃当作四杰之冠。

“初唐四杰”的创作虽然各具特色,但总体上说,他们继承寒士文学的传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宫廷文学的道路。这一点直接表现在四杰对“龙朔文场变体”的批判上。

贞观年间,重臣文人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六朝绮靡诗风进行了批判。然而由于理论缺乏创新,改革文风的努力归于失败。到高宗龙朔年间,六朝绮靡文风复炽。一方面表现为《瑶山玉彩》(上官仪、许敬宗等编)、《古今诗人秀句》(元兢等编)等摘古今英词丽句的类书和前代诗歌选集大批出现以



及“文选学”的兴盛；另一方面表现为“绮错婉媚”的“上官体”诗的流行。四杰则是当时反潮流的旗帜。杨炯《王勃集序》云：“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木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择。”由此可见王勃、卢照邻在龙朔年间曾大张旗鼓地反对“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文风，并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响应。其结果是“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峻”（《王勃集序》）。

王勃的文学观与他的祖父王通一脉相承，沿袭了儒家重政教的文学传统。王通（584—681），字仲淹，是隋代大儒，谥号“文中子”。今存《中说》，模仿孔子《论语》体例。王通承袭先秦较为宽泛的文学观念，否定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了文学的特点，把文学当作经学的附庸。他认为“文”必须“贯乎道”，“济乎义”，合于“雅”而“及理”（《中说·天地篇》）。并以此为标准对南朝的诗歌进行了彻底否定。王勃曾为王通作《续书》一百三十篇，其文学观念受王通影响是必然的。他同样以为文章是“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因由其轻重”（《平台秘略·艺文》），诗歌应该“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辩得失”。他否定文学审美特